

金
石
文
化
之
旅

中國西南
銅商經濟
縱橫談

楊德昌◎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杨德昌，男，1940年生，云南会泽县人。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荣誉研究员。长期从事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以引进新工艺，持续推进企业技术改造见长。主要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特色行业生产方式，曾实地考察社会生产力和劳动者生存状态，寻觅地区社会历史具象，至今未辍。

主要著作：《会泽文化之旅：铜马古道篇》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会泽文化之旅：铜商经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 / 杨德昌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482-3239-1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铜—冶金工业—工业史
—会泽县②铜—商业史—会泽县 IV. ①F42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24035号

策划编辑: 赵红梅
责任编辑: 周 飞
书名题签: 于光远
封面设计: 刘 雨

中國西南 銅商經濟 縱橫談

杨德昌◎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理焯教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239-1
定 价: 56.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前 言

尹正祥

读完《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一书，掩卷沉思，有两个画面，在脑海中烙痕深刻，挥之不去。

一个是杨德昌老先生灯下写作的镜头。一位年近80的老人，在无名无利无压力的状态下，勤于笔耕，在已出版《铜商经济》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历史上东川（今天的会泽）为中心的地区的铸币、京运、会馆、斑铜、白铜、迤砚、造纸、制盐等经济现象和工艺流程，形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作品。这种精神，这种对乡土文化的执着，对脚下这块土地的热爱，正是我所提倡的老有所为，活出生命的品质，“抒未抒之志，了未了之情”的真实写照。作者本身的写作冲动和创作行为就是给这个社会提供正能量的文化基因，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应该继承和发扬。

另一个是几十匹马为一队的数十个马帮在乌蒙山弯曲回环的古驿道上驮运铜矿、铜钱的镜头。“山中的驿道好长好弯，驮铜的马帮走在云端。”赶马人的吆喝声，头马的铜铃声，铜运长期积淀形成的男女对唱的山歌声，仿佛还响在耳边。作为穿行在蓝天白云之间的文明使者，货物周转的主要交通工具——马帮，是马背上颠簸出来的知识、阅历和记忆的生产者。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不可能写得如此细腻和深刻。事实又一次佐证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论断。

本书作为一本研究会泽历史上文化、产业发展、工序工艺的书籍，

我认为有三大特色、三大价值。

特色之一：“纵”，时间跨度大，史实丰厚。会泽铜商文化“上下三千年，纵横一万里”，其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广。作者以清朝185年的铜冶京运为主轴，往前延伸至3200年前的商朝晚期，往后对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东川区铜的开采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今天的斑铜、迤砚、印刷的发展过程以及作者对发展这些产品的实践与思考进行了归纳和提炼。

特色之二：“横”，空间跨度大，产业链长。作者以会泽的铜冶铸币为依托，从铸币原料的角度研究昭通的银、贵州的铅；从产业配套的角度研究白铜、印刷、马鞍、食盐、迤砚、会馆等冶炼铸币配套和铜产业带动的相关产业和产品；从京运的角度研究马帮的京运路线，对站点、时间、沿途接转管理等环节进行分析论证。这种以时间为经，产业、产品、历史事件为纬的纵横论述，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铜商经济体系。

特色之三：“亲”，祖上传承久，亲身经历。写历史上的人，靠的是大量的资料占有，前人和他人的记录和感悟。而《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除作者确实占有丰富的史料之外，更多靠的是作者作为鞍匠世家，祖上传承的家风、知识、思想，作者少年时代亲身经历所留下的深刻记忆，由此而生长出来的对马帮的情感，是骨子里面的东西。把这些通过精心整理形成文字，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会泽这块热土，对铜冶、马帮、印刷等行业的热爱，对祖辈们的敬仰，这些特质是单纯靠资料写作形成的其他书籍无法比拟的。

价值之一：史料价值。书中所研究的铸币工艺和管理、马帮文化、马帮精神、江盐提取、印刷术的发展与演变等内容，以及其中一些已经失传的工艺流程，在我看来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它为后人研究历史、研究工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珍贵的、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其对历史记述缺失的弥补、对后世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露出来。

价值之二：支撑价值。“一山宝气钟千古，四野炉烟绕万年。”这是会泽历史上铸币局大门上的对联，有了“一山宝气”，才有“四野炉烟”。同理，有了铜商经济，才有铜商文化。铜商文化是铜商经济发展的文化遗存，铜商经济是铜商文化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铜商经济，那么铜商文化将是无源之水。《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一书的理论体系、史料史实、知识要点有力地支撑了会泽的铜商文化，使得铜商文化更加厚实、丰满，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铜商文化更加可信，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后人、对游客的化育功能会更加强大。

价值之三：应用价值。铜商文化毕竟是一种历史文化，而历史文化要转化为旅游文化，变文化资源为经济优势，需要把文化项目化、景点化，为文化找载体，为文化寻求表现方式、表演方法。《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中的很多知识，特别是马帮文化的相关知识，为以后建设“马帮文化”的专业博物馆，为拍摄马帮文化剧目，提供了丰富的甚至是戏剧性的内容。江山代有才人出。我深信，以后从事会泽文化旅游的仁人志士，一定会从中汲取营养，把《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的部分内容转化为旅游文化，用历史上的“铜商经济”发展今天的“会泽经济”，从而建设会泽，造福桑梓。

(本文作者系会泽县政协副主席)

2018年6月

序 一

贵在独一无二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序

郭兴良

怀着愉快的心情，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杨德昌新著《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感到与他出版的另外两部专著“会泽文化之旅”之《铜马古道篇》《铜商经济》一样，内容独特、风格凝重，而本书的可贵，更多地体现为独一无二。

何以见得？且往下看：

亲历特有 杨德昌出生在一个马鞍匠世家，不仅熟悉并直接参与马鞍制作，更从小跟着运铜马帮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对运铜的路线与马帮的千辛万苦、具体运作、生活状况耳濡目染，对马锅头与赶马人的生存苦乐与情感世界，入微体悟、铭刻心中。直到晚年，他仍跋山涉水，不顾劳顿，到当年走过的地方再次实地踏勘，如2010年偕胞弟探访古城会理，从而“打破只知本地（会泽）才有钱局的片面认识，丰富铜业开发和鼓铸的经营范围和历史文化内涵”。2015年，为考证铜镍合金冶炼起始，年逾古稀的他，再次亲赴会理，与地方史专家孙国茂、祁开虹、李华翠交流，并在孙先生引导下拜访耆宿，观瞻故地，不仅丰富了原有的“会理情结”，还进一步“加深了对会理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的认识，真实感受到运用祖先传袭下来的冶炼方法，加以实践中的智慧创造，是会理先辈的矿工、炉工创制冶炼合金的必然。”

作者如此探故地、访达人，意在“力图寻觅一丝封建社会晚期曾

经辉煌繁荣的码头集市人文风情的个人体验”，“从人文角度来观照 18、19 世纪滇川黔结合带社会经济形态的功用”，这对纯文献考据无疑是颇有价值的坐实与补益。宋代大诗人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德昌的“躬行”，深化并确证了他的“纸上得来”。

又如钱币制造，由于作者从小在铸币的会泽“宝云钱局边长大，幼时见到过铜板、镍币、银双毫、银半开的流通使用”，见过玩弄“咸丰重宝当十钱”、通洞钱的情景。1958 年读高中时，亲自参加用宝云新局遗存铸钱漏渣的复炼，以及祖辈对宝云局内事象的模糊印象，更受“寻觅这里曾经辉煌的铸币业绩”责任感的驱使，他外出考察，潜心研究，终于推演出先辈们通过智慧劳动，“将金木水火土资源，转化铸造出钱币的场景”。在 2002 年会泽首届旅游文化节期间，借宝云新局修复之机，亲自作了铸币演示，依照古法复造出了“嘉靖通宝”和通洞钱，我在电视上观赏了这一幕。

上述种种，亲历者无一能写，能写者无一亲历，既从小亲历又能详忆细写者，独一无二，唯德昌一人！

实录精细 这是会泽铜文化研究中的弱项，因为当年的不少亲历者，虽能道出会泽铜业的方方面面、大大小小，但他们或已过世，或早已淡忘，唯既亲历过又有心之德昌能够清楚记得并钩沉道出。

例如，对会泽当年如何运用古法铸造钱币？德昌就能详细描述从挖土、踏泥、拉坯、装窑、出窑烧制出成千上万个“铸钱罐”的系列程序，而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到如何选木材烧炭，如何精准掌握火候，操作铸炉的匠役怎么上班、换班以及他们怎样开伙、穿着何种样式等，杨德昌都有清晰的描述；至于定匠 21 人的每个铸炉，如何按炉长、掌炉、浇铸、装模上框、打磨、杂役 6 个岗位分配人数、确定职责，无一不叙写得清清楚楚！

作者的叙写情意绵绵，他以感同身受的体验，表达对先辈们艰辛劳苦的敬仰和感念，而我除与德昌同感外，也对他如此以细致入微的

笔墨对先辈劳作进行的文字留存表示由衷的赞叹！

此外，作者在写宝云新局时，说明鼎盛时炉房（车间）多达 300 间，以炉为单位，每炉按木炭杂物铜锌铅料、沙型制作炉子、浇铸、打磨、贮藏、起居室共 6 间计，说明当时宝云新局铸币炉多达 50 座。而铸币炉有多高、面积多大、炉膛表里怎么做、炉膛边的正铸罐、带铸罐，其大小、位置、熔铜液、耗时以及平均成本诸项，都一一说得明明白白。

甚至更细到浇铸时使用的工具，诸如夹持铁钳、抱箍钳、老鹰嘴钳、打渣小铁勺等各种铁件，翻砂箱（铸币木框）、铸币木条、马槽浇铸架、大小铲、母钱盒等多种制砂型工具以及刮刀、小锤、小雕刻刀等七八种锉磨铜钱工具，都毫无遗漏地做了介绍。

为了让今天的人能读懂书中所涉铸钱局专用术语和钱币单位换算，作者详细介绍并解释了通宝、镇库钱、铜息、铸息、卯、串、钱串索、溜堆、堆兵、更夫、钱褡子、怀窝等术语的意思，还说明了钱币的重要单位、重量换算以及清代货币与 1993 年人民币兑换的币值。

此外，对当时铸币的管理、监管、保密、人事、财务核算等各项制度，作者也进行了详细介绍。

上述种种内容，可以说具备了词典、手册的功能，如此深入细致的钩沉、发覆，堪称是本书独一无二价值的体现。

留白消减 铜文化是会泽历史文化的核心和重要特质，会泽本土和域外专家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留下了不少空白。德昌本书有意避开已有成果，而专在“留白”处着力，这类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

以篇幅够大的白铜为例。在简叙占世界冶金史重要地位的中国白铜独特成就后，他浓墨重彩地详述了中国大西南白铜的历史和生产情况。

为此，作者“怀着自幼就萌动的宿愿，在古稀之年从会理经西昌、越西到雅安、邛崃抵成都”，或乘车、或徒步进行考察，重点考察了会

理白铜生产的“资源汇聚”“燃料及矿料采掘”“管理及炼场”“镍白铜的冶炼”以及作为其“侧叙参照”的红铜冶炼。2015年，他“浏览着安宁河谷数十万亩翻滚的金黄麦浪；登高至越西、甘洛的山口上，面对川西高原雄奇的千山万壑，迎着远山刮来的雪风，俯瞰着车窗外汹涌的大渡河波涛；再伫立于静谧的青衣江畔”，面对会理所处的灵关道，他感叹工程何等艰险，并“感佩于古代先辈们的开拓精神与超常的繁重劳动，灵关道选址、定线的科学性，于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闪耀着谋划者、执事者智慧劳动的光华。”这些描叙并非多余，它实际上暗含了会理成为镍白铜首产地，绝非偶然。

作者在叙写整个云南白铜生产的历史沿革、材料配制、生产区域、冶炼情况时，重点描述了会泽与白铜的关系，他通过祖辈口述和亲自踏访，得出结论：不能因为爱乡之情，就硬把“会泽最早出白铜”的美誉“强加于斯”，尽管会泽确曾是“古代镍白铜最重要产地”之一。“最重要”并非“最早”，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作者在指出白铜是“对纯铜、镍铜合金、锌材料合成后的二次加工熔炼产物”后，指出“云南白铜是民间采办”与“清政府垄断（即官办）的滇铜”在规模、冶制用途、使用者乃至税收等方面都迥然有别，这在界定“铜商文化”命题时，具有十分明晰的逻辑意义和历史价值。

我很感兴趣的是，本书用了较大篇幅专门描叙“近代欧洲文明殿堂中的‘银光’”。在看了白铜西传到欧洲的简史、工业化生产和风靡欧洲的情景后，我第一次明白了欧洲那些被称为“德国银”“金属石”“新银”，并以它们制作的灯架、容器、勺兑具之类的宫廷用品、艺术装饰品、管乐器，原来“都有白铜耀眼夺目的身影”，作者2016年10月在法国凡尔赛宫所见即是如此，我则由在欧洲见到的这些豪华“银器”联想到见惯了苗族同胞的“苗银”饰物，也许它们不完全是纯银，我小时候用过的“银器”，或许有些就是白铜，因为我家很穷，似乎是无力奢用白银的。

白铜与白银有何不同？作者从质地、色泽、落地、声音与弹跳四方面介绍了区别方法，并从区域、交通、经济、技术、资金、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当他因“资料有限”，不足以确定所得结论时，他只好以红铜土法冶炼流程为“侧叙参照”加以推测，同时将数十年“亲闻白铜事象”“亲见白铜物件和体验诉诸笔端”。由此，作者认为白铜研究的“留白”甚多，会泽白铜研究的疑点、难点、空白点更是值得继续开垦的历史文化“处女地”。

而作者的白铜研究开启了这一领域缩减会泽历史文化研究“留白”的新历程，其所见所闻所识，至少在目前是独一无二的。

莹拂陈说 在会泽铜文化研究中，有些成果基本上获得了共识，但稍嫌不足的是，或欠精当，或显粗疏，为此，作者下了一番莹拂功夫。

莹拂，本是拭去美石尘垢、琢磨使发光之意，喻阐明事理，去惑显真。

例如斑铜，一般人知道它是精美的工艺品，还知道其工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到云南斑铜也往往首先提到昆明斑铜厂。这些当然都不错，但杨德昌做了许多补充和新的解说，使许多陈说显得更加明晰、光亮。

作者认为斑铜起初只是含非铜的金属“杂质”有斑块斑点的“杂铜”，销售不好，价格甚至低于红铜，故清代中期以后，初期形态的斑铜，不过是“会泽铜匠使用本地铜料，在铜器生产过程中相伴而产生的一种纯度不高的铜质制品”，到清末滇铜京运衰落、制铜业兴盛后，一些有点文化基础、手艺高超、喜欢打造精巧物件、肯动脑筋又深谙铜质特征的老铜匠，才使“带斑状的铜制品，脱离了初期斑铜形态的范畴，而以独立工艺品种的形态现身于世面”，因此斑铜之名是东川府城会泽“铜器铺店主与铜匠在生产和销售中发明的专用名词”。

由此可见，会泽铜匠“是斑铜器物的打造者，是斑铜工艺品的研发者”，会泽也因此成了斑铜的诞生地和发祥地。

为了维护会泽斑铜的良好声誉，作者指出其工艺发展中的“浮躁不实劳作”和“小生产者的门户之见”，希望能与全省同道“总结创制

出云南特色的行业技术质量标准”，大家聚心合力，“在中国工艺美术的殿堂中，彰显出有色金属王国——云南铜工艺的斑斓色彩，创造出新时代斑铜艺术的辉煌”。

我赞赏作者这种从小在与铜业相伴环境中形成的真知灼见，为他追求斑铜艺术健康发展的拳拳之心所感动。

此外，作者对黔铅在“铜铅各半”铸币比例定则中的重要和川盐之于铜马古道的繁荣也作了必要的补释，这也是一种“莹拂”。它们及本书对斑铜的专述，与同类著作相比，也是独一无二的。

再现情景 以理性叙述为主的本书，情景再现是最具形象性、趣味性和现场感的描写，它增强了学术性著作的可读性、感染性和亲和力。

本书这类例子不少，如写使用金属货币的情景：

一般老百姓有了一两或几钱银子，那是比较值钱的，一分银可买一升米够一个七口之家吃一天，他们小心地把银放进小布袋，揣在怀窝里，或嵌于头戴的‘卷边毡帽’宽边的底部贮藏。

由于铜钱体大量重，街上往来的生意人和马锅头，把成串的通洞钱装在肩上的钱褡子里，交易时则看到：

拎出成串的铜钱堆在商铺当街的柜台上，再数上数十文另外的散钱，堆数钱币的声响，令过往的贫者投来羡慕的眼光，器宇轩昂的持币者又会从自己的麂皮兜肚里掏出五两二两的银锭摆放在铜钱的后面，这时清理钱币的店主，一面收钱装入比现在财务常用保险柜容积大，能在上面坐人的木银柜，一面讲颂着吉利语言，双方在笑语中，满意成交。

这样的描写，动作性、画面感很强，是非亲历者所难以描绘的。

同样，他写“烈日下穿短裤赤身肩负近二百斤货物的船工、运脚

在江岸装卸货物时，合着脚步哼着号子的低沉声音，在蓝天白云下，山箐林莽间赶马人高亢的山歌声”，也无不活色生鲜，给人留下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印象。

为了让情景再现得更生动，他还引用知府方桂“亲临观戏并附前人诗存”来表现匠役的娱乐生活，引民间的山歌、小调来反映赶马人的情感，尤其是引入镇雄知州饶梦铭所作《铜运歌》，这首长达80句的七言排律，成了谋划工程的先人智慧、督责长官的酸楚和运工们辛苦的“实录”。总之，这些艺术再现成了会泽铜文化的伸展和涸延。

新见独到 学术研究最忌蹈袭陈说，即便一些似成定见的话题，也不要人云亦云。德昌明白此理，故同样的话题，他往往能发表新见，或做出新的提升。

如，当年人马簇拥的铜店旷场，可谓花柳繁华的商务经济区，却只有四合院、花园、阁楼，而没有似乎少不了的妓院青楼。为什么呢？作者从两大块人群进行分析：“从事铜业管理的官员、职员、经营铜产业的炉头富户”传统意识浓厚，不敢在众多庙宇的菩萨跟前放纵淫荡，害怕因此破财遭灾；而“大量普通劳动者”忙于生计，无心“问津烟花行当”，即使兑了铜钱银子，也只会邀约行帮同伙喝酒吃肉，最多凑合去店主房间抽两口鸦片烟便很满足了，他们更多“想的只是祈求老天爷保佑发财，根本无暇去淫荡‘玩格’，所以公开的烟花行，当然就不具备算命瞎子和巫婆神汉那样的‘市场优势’了”。

又如随铜业势旺而兴的寺庙会馆，一般研究多在描绘其盛时繁华、热闹的各种多样活动上，而作者特别从铜业经济要素禀赋由优转劣（包括京铜收益和资金转移、原投资者主体离异、本地经济来源式微）、会馆与社会发展相悖（包括以邻为壑固守祖业、抵御正当商品流通、维护封建体制及其意识保守）、管理粗放（包括手段落后、呆滞、堕落者贪腐渎职、坐吃山空、社会动乱财源枯竭）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会泽会馆的衰败之因，并描绘了几个主要会馆破败的惨况，这实际上补全了会泽会馆研究的重要空缺，使会泽会馆文化史显得更加完整。

此外，他对马帮文化内涵、弊端的概括、分析，对马帮精神的具象表现、理论提升、价值延展以及发掘、弘扬的建议，都堪称是独一无二的创见。

书中列制《乾隆中期各省局铸钱数量》《云南铜产鼎盛时期数量》等10多个表格，引用乾隆十七年（1752年）云南巡抚爱必达《关于就地解决军饷的方案》等资料以及20多幅图片，虽非作者独创，但它们既省了读者的翻检之劳，又起了对文字描述佐证和补罅的作用，也是弥足珍贵的。

读完全书，我稍感不足处有三：

其一，全书详谈会泽，涉别地甚少，书题却冠以“中国西南”，显得题目过大。

其二，题目标示围绕“铜商经济”做纵横谈，但当年的会泽铜业，包括矿冶、京运、铸币是政府（朝廷）行为，而非商业运作，至于白铜、斑铜沾点“商”，但均微乎其微，故言铜业之“商”，鲜少其实，难以支撑起“铜商经济”的界定。

其三，有些内容，如印刷、迤砚，与书题无关，会馆虽因铜业而盛，但所叙与书题亦无直接关联。

有鉴于此，愚以为在“会泽文化之旅”的总目下，以《会泽铜文化及其他》为题是否更妥切些？

当然，这些只是就题文关系所发的一点拙见，实际上，就那些“铜文化”都囊括不了的内容，本身也是十分珍贵的，是作者心血的结晶，将它们作为“附录”加以保存，或另成一书，当也不失为会泽文化研究有价值的成果。

总之，德昌此书与已出的两部专著，奠定了他在会泽历史文化研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也是可喜可贺的。

2017年12月完稿

2018年元旦改定

序二

多维视域中的铜商经济

杨德辉

不敢说惊世骇俗，起码可以说是别开生面。杨德昌的《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以翔实的丰富资料，结合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及西南一些地区的铜业史迹予以解析考察，在纵横远近的交互探寻中，始终把握着铜商经济这个主脉，在多维视域中全力理性观照，赋予中国西南铜商经济历史面貌一个清晰的显影，掀开了铜商经济研究新的一页。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应该是一个内涵深邃、外延广袤的经济表征系统，它或许将钩沉若干遥远的史实、触动古今相关的不少政举，借助和渗入许多基础学科、涉及并再现纷繁的社会生活，将会是独具理论个性的一个领域。而在其未形成完整理论研究体系之前，杨德昌积极进取，没有裹足不前，形散而神不散地以“纵横谈”的方式，开创性地展开了对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的探索，踏上了一个闪亮的起点。

多年来，众多的专家学者筚路蓝缕、染翰操觚，对铜商经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成果虽不能说全都片笈片玉，却也不乏高文佳章。但引人深思的是，这些研究大多囿于一隅，受地域的限制，仅就古东川的铜业加以阐发，且总是以铜论铜，无疑显见了封闭性局限。杨德昌却是在多维视域中去洞悉铜商经济，他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综合、勇于发现，相对于仅以古东川铜业为对象的研究，《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则真的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奇思妙悟引发了大思路

围绕着铜商经济这一主脉，全书共集纳了五个部分：铜业精粹、马帮运营、会馆兴衰、手工掇实、京运拓视。这五个部分从总体上完成了铜商经济研究的时空拓展——从云南本土延伸到了相关地区及四川、贵州，从铜业延伸到另业，从古代延伸到当代。这种拓展延伸，反映的是铜商经济的历史真实，是建立在客观的现实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而绝不是主观幻想的分析和综合，更不是唯心主义的臆造。恩格斯曾经指出：“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①作者集纳的这五个部分，正是在中国西南铜商经济中“以前”就“存在”的，因而这是按照铜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实现的自然天成的集纳，而并非如恩格斯诙谐嘲笑的那样，“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

杨德昌出奇的思维方式，驱动他大胆而审慎地思考，并潜心考察探求，形成了渺远宏阔的大思路，从而把铜商经济的研究界定到“中国西南”的范围。

在《世界冶金史上首先发明的白铜》一文中，有对四川会理的铜业特别是镍白铜生产全面深入的研究；在《东川府的食盐》中，论述了四川食盐对铜商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而在《滇川黔区域的经营》中，对铸币的重要原料黔铅做了详尽的记述；联系京铜运输，书中还多次叙及滇川的水陆通道。就是这样，作者的大思路将滇、川、黔融为铜商经济的同一考察系列。

例如对四川食盐的考察，作者有明确的论断。东川府辖区内，铜矿等金属资源丰富，而食盐缺乏。清代改土归流后，铜业大兴，城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第81页。

化进程推进，人口大增，民众食盐量也大大增加。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东川每年630余万斤的京铜须马帮驮运，经昭通到宜宾。为使马帮返滇有回头货驮运以降低运脚成本，同时也为了民众的食盐供应，便让马帮驮运川盐回滇。书中记叙说：

五尺道起点的宜宾，是入滇的门户，其毗邻的盐都自贡，所产人民生活必须食用的川盐，运至滇黔结合带，正好解决了赴川马帮回头货的难题，乾隆时期每年进入昭通的川盐达3.6万驮。这样，京铜驮到万里长江第一市的宜宾，由合江门码头附近启航更便捷，能确保每年9批京铜起解。

于是，四川便自然而然地纳入了铜商经济圈。

剔除若干繁复的枝叶，古铜文明最辉煌的主干就是清代的铸币，因而人们都说东川铜支撑着清王朝铸币用铜的“半币江山”。铸币，其主要原料除铜之外，就是铅锌，这就在所难免地将富产铅锌的贵州纳入中国西南铜商经济圈中。对此，在《滇川黔区域的经营》一节中有具体的阐述：

人们在谈论铜钱时，往往只注意到滇铜，岂知每枚铜钱中还含有45%~48%的铅锌？而清代铅锌的主产区就在大西南“铜银产业带”上的贵州，故称黔铅。作为铸币主要材料之一的黔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施京运。就像滇铜京运一样，每年数百万斤的黔铅，走出大山，配以河运投向长江与京铜相向而行运往京城。

黔铅开发自康熙五十七年至咸丰三年（1718—1853年）一百多年中，平均年产量在767万斤左右，乾隆二十四年至三十年之间（1759—1765年），年产量高达1400万斤，总产量占清代铅总量的67%~84%。黔铅与滇铜共同支撑了清王朝铸币产业，实在是功不可没！